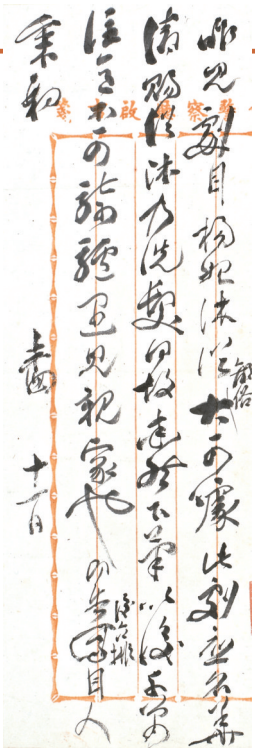


崇川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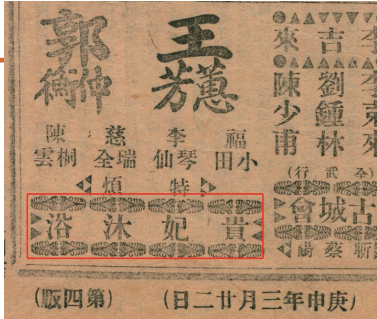
## 张謇改剧名

◎赵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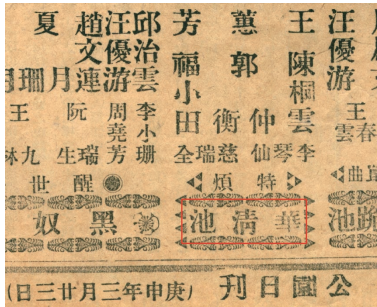
备受张謇关心的交流演出,不料在南通的海报这一环节上,因一个《杨妃沐浴》的剧名暴露出自家文化的浅薄粗俗。张謇对此当然不能放过,于是才会有那封短信,借此也可领略一下状元公的语言艺术。



张謇写给薛秉初的短札。



1920年5月10日《公园日刊》海报栏上的《贵妃沐浴》。



1920年5月11日《公园日刊》海报栏上的《华清池》。

自从1919年开始,张謇邀请欧阳予倩等协助,在南通大张旗鼓地进行戏剧改革的实践。张謇之所以要大事改革,主要还是看到戏剧在当时社会的覆盖面大和教化力强,最有助于改良社会。他在那时写给梅兰芳的信里就论说道:“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,不自度量,欲广我国于世界,而以一县为之嚆矢。至改良社会,文字不及戏曲之捷,提倡美术,工艺不及戏曲之便,又可断言者。”显然,张謇希望利用这个形式来收移风易俗之效,从而提高全民的文明程度,完善其对南通“新世界雏形”的经营,并进一步去示范全国,对话世界。

当时进行的戏剧改革约分为三个方面,一是精选剧目、改编剧本,以健康有益的内容来感化、影响观众。一是摒弃旧戏班的授徒模式,创办伶工学社,以全新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来养成新一代戏剧人才。还有就是通过对更俗剧场的建设,来提高人们的文明素养。对于最后一项,张謇似乎尤其关注,因为他曾说:“最足以觐吾理想是否确当,各办事人之方法是否适用,地方普通社会常识今昔比较是否渐有进步者,剧场也。”在这方面,他除了对大事的全盘把握外,许多细节也不轻易放过,正如他的告白:“謇虽至庸懦,而矫正地方风俗,引为己任,必自细微积至于高大也。”这种细处,甚至能具体到座位号数字的选择,而他为剧场海报改剧名,也是其中的一例。

改名之事见于张謇写给薛秉初的一封信,全文为:“昨见剧目《杨妃沐浴》,鄙俗,大可嫌。此剧应名

《华清赐浴》。‘沐’乃洗发,何故率然下笔?以后千万注意,不可骑驴遇见亲家也。即告后台排目人。秉初。嗇,十一日。”

薛秉初其时是更俗剧场前台经理,而信中那个“嗇”,则是张謇自号嗇庵的简写。信中没有署年月,只有一个具体的“十一日”,不过我们还是能够通过那时更俗剧场发行的《公园日刊》把日期确定下来。

1920年5月10日,即农历庚申年三月廿二日的《公园日刊》,其海报栏刊布当日夜戏,最后一出的名称就为《贵妃沐浴》,而演员是王蕙芳、郭仲衡、福小田、李琴仙、慈瑞全、陈桐云。次日报上刊布的夜戏,演员仍是原班,戏名则改成为《华清池》,只不过当日压轴戏换成夏月珊、夏月润等的《黑奴吁天》,这个更换,想来系因夏氏的名头更大的缘故。

以《公园日刊》与短信比照,那个剧名《贵妃沐浴》与张謇所说的《杨妃沐浴》并不全同,推想张謇所说的名称并不来自这报纸,而是在剧场现场的海报牌上看到的。至于后来报纸上更改成的《华清池》,则是此剧的另一个名称,也不是张謇希望改的《华清赐浴》。不过,这个更改显然是同一件事,时间也正合适,张謇信中的“十一日”用的是公历。通过改名之事,还可以看到那时剧场在接受张謇意见时,容有自己的处理空间,而不是亦步亦趋、唯命是听的。这一点很值得注意,因为它能够反映出那时相互间的一种宽松的关系。

《公园日刊》在介绍此剧演员时,前面冠有“特烦”二字,说明这班人也有来历。徐海萍的《南通京剧

发展史》,有一段写到这次演出的背景:“1920年春,汉口大智门大舞台很羡慕南通更俗剧场欧阳予倩和芙蓉草的盛名,有罗致的意思,奈他们在通订定演出期限,不便前往。为了调剂观众视听起见,特向前台建议,和汉口大舞台交换演员,汉口拟派王蕙芳、郭仲衡、金仲仁、慈瑞全、福小田来通,南通由欧阳予倩、赵桐珊、查天影、苗胜春前往。订期一月,双方包银依旧由两剧场担任。经张季直同意,就于3月底实行,后台总管事由李琴仙代理。欧阳等到汉口以后,大受汉口观众的欢迎,《红楼梦》诸剧尤为该地人士所赞扬,赵桐珊的花旦戏也很红。张季直对艺员往外地演出非常关心,时常写信勉励他们在品德和艺术方面要特别注意,要替南通争取荣誉。王蕙芳是梅兰芳的师兄,郭仲衡是著名的汪派须生,金仲仁是名小生,慈瑞全是名丑,福小田是名净,都是北京素著声誉的演员,如果不是交换演员,决不容易到南通的。”

这个备受张謇关心的交流演出,不料在南通的海报这一环节上,因一个《杨妃沐浴》的剧名暴露出自家文化的浅薄粗俗。张謇对此当然不能放过,于是才会有上引的那封短信。信末尾关照语中的“骑驴遇见亲家”,源自一个民间谚语,原句是“骑马不遇亲家,骑驴却遇上了”,意谓骑马远比骑驴来得威风气派,可是骑马这值得显摆的东西人家没有看到,却因骑驴把自身的寒碜暴露出来。张謇是借此批评办事人的欠学或疏虞,话却说得委婉风趣,借此也可领略一下状元公的语言艺术。

往日情怀

## 电火

◎何台

电灯泡通电后钨丝发光,叫“电火”,我们村的老人至今仍把电灯称为“电火”。

1972年,我们村建了电灌车口。1973年春,电线从电灌车口拉到我们队,全队人兴高采烈,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电工师傅和队里的几个壮劳力一起挖坑、埋电杆、铺设电线、牵电线进屋。我还记得,大队(村)里的电工师傅是一个姓任的下放知青,我们队里的电工叫缪三富。电灯(电火)亮起的那一刻,孩子们沸腾了,大人们也喜笑颜开,喜庆的场景堪比过年。老人们更是笑得合不拢嘴,“电火”亮了,“茄儿灯”(电灯泡像茄子一样)亮了,点灯竟然不用油了。

“电火”比煤油灯亮多了。但那时一般人家也就点个15~25瓦的白炽灯泡,电灯开关全是黑色塑料壳的拉线开关,时间一长,拉线连根磨断,就得重新更换,很烦人。奢侈一点的人家用上40瓦的日光灯,需要配上电容器、变压镇流器,电压不稳时,日光灯的光亮也很一般。能用40瓦日光灯的人家,都是有头有脸的大户。那时的老百姓节约意识特强,我们队有姓郑的兄弟三人合用一只电度表,每户人家只用一只3瓦的荧光灯。就是这3瓦的荧光灯夏天也舍不得用,夏天的晚上,他们把小桌端到外边吃晚饭,就不要开灯了。三户人家每月的用电量只有一度多,这话说起来现在都没人敢相信,但事实就是如此。

刚用上电的那两年,用电事故经常发生。1973年8月,我有一个姓薛的同学就是触电身故的。我们隔壁村还有一个人触电事故后,将手臂锯掉了。那时供电部门经常下乡宣传安全用电知识,“不管你是七级工八级工,不是电工不要瞎弄”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。

那些年,农村的电压很不稳定,“电火”有时很亮,有时只见钨丝红红的,光线很暗。停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白天多停电,晚上也经常停电。夏收、秋收大忙,生产队等着脱粒,人们只能吃过晚饭在生产队晒场等着来电。正月里,农村宣传队晚上演出,在接好电灯的同时,也要备上汽油灯,以防停电。老百姓家办喜事请客吃饭,得准备几盏罩儿灯,否则停电了就“没手抓痒”。那时家家户户虽然通了电,装了“电火”,但煤油灯还是必不可少的。还记得,20世纪70年代末,我在公社中学读高中,晚上有自习课,因为经常停电,学校里每个教室都要准备汽油灯,住宿的同学都需要从家里带罩儿灯及煤油灯到学校,时不时地“挑灯夜战”。据说当年我们县里只有老三镇海安、曲塘、李堡的电力正常,其他乡镇都不能保证正常供电。

如今的电灯跟从前拉线开关的“电火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,把我们的生活打扮得五彩缤纷。